

序言一 时代的呼唤和信念

刘 吉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执行院长）

我有幸作为《中国可以富》清样的读者。随着一章一节地读下去，作者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地站在我的面前：一个文才横溢的青年，一个忧国忧民的青年，一个肯动脑筋的青年，一个刻苦努力的青年，一个富潜创造力的青年……

这本书是张庭宾多年记者生涯的纪实与思考。中国的记者是最难当的，因为“不准”太多了；中国的记者也是最好当的，因为只要拿一下“新闻统稿”就可以交差了。然而，大自然启示我们：风和日丽的春天自然百花齐放，但也会令人眼花缭乱；正是风厉雪飞的冬日，才更显现出红梅傲枝的光彩。因此，张庭宾的这本处女作就是难能可贵的了。它是千年世纪之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艰难阵痛的大写实，一个青年独具慧眼的长卷画。

读完《中国可以富》，我油然想起毛泽东赞美青年的话：年轻人抓住真理，所向披靡。青年人要有这份追求真理的锐气。这份锐气不仅是个人事业成功必不可少的起点，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当然《中国可以富》不是，也不可能是，也不应苛求它是十全十美。作为记者，有些观点难免受风左右；作为当代青年，文风难免有“新人类”味。我本想具体指明一二，但还是忍住了。因为好为人师是老年人的通病，老年人要知道自己的不足啊！我常劝年轻人多读点哲学书、历史书，从而思维和文章就更富有哲理感、历史感，也就有更深刻的文化底蕴了。我想，这大概是不会错的。

我特别欣赏《中国可以富》这个书名。它表达了一代人的真诚呼唤和不屈信念。中国富，不是几个人进入什么世界首富行列，而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达到 13 亿同胞共同富裕。可以富，还不等于一定就富，中国人还要把自己的历史责任担当起来。人人都付出一份对中国赤诚的爱，一份莫问回报的努力，中国还能不富吗？

情长纸短，是为序。

序言二 上下求索真诚磅礴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中国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

应张庭宾的盛情邀请，我非常高兴地为他的新作《中国可以富》写几句话。

由于专业的缘故，我经常看各种有关经济方面的报道。在许多文章中，除了得到一些数字、文字之外，我几乎看不出来媒体的国家价值立场，看不到记者的民众情感取向，因而很少有人能记得住这样记者的名字。可是，当我读到张庭宾的文章时，我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一位年轻的记者不辞劳苦，不畏风险，在工厂、农村奔波着。他追逐着改革开放的潮头，传递着经济改革的脉搏。他的文章不仅有热情，还有思想。最重要的是在他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他把自己也放了进去，他是一个中国人，他“上下求索”，探讨着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字里行间充满着真诚磅礴的爱国热情。尽管他的某些观点还不够全面，有些地方有些偏激，但是，毫无疑问，由于他的文章中包含着火一样的热情，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

这本书的名字叫作《中国可以富》。这个书名非常好。多少

年来，中国人一直有个国强民富的梦想。为了让中国富起来，不知道有多少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由于中国一穷二白，长期以来被西方列强欺辱，某些人染上崇洋媚外的软骨病，好像中国人什么都不行。这种人目光短浅，数典忘祖，一副奴才相。难道他们就不知道，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出现过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在世界四大古文明当中只有中华文明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且不谈汉唐盛事，直到 1500 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1830 年，中国产品占全球制造业的 30%。直到 1850 年，中国经济依然在总体规模上雄居世界第一。

可是，后来中国从富庶的天朝大国逐步跌落下来。中国在世界上的排名一直在下降。到了 198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 4%，人均国民收入几乎敬陪末座。贫穷就象影子一样黏在中国身上。

为什么中国变穷了？从外因来看，中国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只要翻开史书，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告诉人们，落后就要挨打。

1842 年，鸦片战争失败，在英国军舰上签署了《南京条约》，痛失香港，赔款 2000 万两。1858 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赔款白银 800 万两。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赔款白银 2 亿两。1901 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白银 4 亿 5 千万两。帝国主义强盗杀人放火，勒索赔款，大量白银外流，中国经济怎能不衰败？

帝国主义侵略是导致中国落后贫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如果只看到这一点，还不能解释全部问题。满清王朝腐朽无能，闭关自守，使得中国自外于世界工业化的潮流。以后，军阀混战，贪官污吏，内忧外患，使得旧中国越来越穷。解放以后，好不容易出现了经济发展的生机，可是好日子没过上几天就要瞎折腾。斗来斗去，弄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

的摸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目前，中国人的日子好过一些了，有些外国研究机构估计，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占世界的15%。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再度成为世界第一。可是，也有一些外国学者不看好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泡沫，是谎言。无论他们怎么说，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正在富起来，中国再也不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居安思危。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中国一定会就此富裕起来。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道路选择的重要性。纵观世界，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一个国家政府政策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譬如，同样在朝鲜半岛，为什么南韩的粮食吃不完，而北朝鲜会饥荒连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菲律宾是亚洲最富的国家。1953年，菲律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1美元，但是韩国只有165美元，香港141美元。菲律宾比其他亚洲国家阔多了。可以想象，那个时候菲律宾人到香港时一定非常神气。可是，到了1999年，菲律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1220美元。而韩国是10500美元，香港25280美元。相比之下，菲律宾几乎变成了赤贫。菲律宾的姑娘，甚至女大学生都纷纷到香港、台湾当女佣。在亚洲各国出现了一个新名词“菲佣”。有的人认为，国家经济政策关我什么事情？好啊，你可以不关心国家经济政策，但是可要当心，说不定由于国家政策失误，你的女儿要被迫出国去当佣人！

从张庭宾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大地上有着许多志士仁人在不断地探索着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中国的希望就在这些不屈的探索之中。让中国尽快富起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中国可以富》是一本好书，我郑重地向朋友们推荐这本书。

代前言

龙腾的天空从此豁然开朗

北京时间2001年11月10日，多哈，中国走进世界，世界走进中国。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喜庆时刻，是一个历经沧桑、心情复杂的中国喜庆时刻。它为2001中国之年的乐章奏下最浑重强劲的音符。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经受百年屈辱、挣扎和奋斗终于迎来了这一历史时刻。

中国与世界在此刻握手，中国与世界的两个市场在此刻相互主动对接，在过去15年谈判中，两个市场不断寻找各自力量的动态均衡，而11月10日这一天成为两者时间和空间转换的均衡点。这一天，世界的市场成为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天空开始豁然开朗。

我们曾有一次在广阔天空中飞翔的机会。当第一个英国公使拜见清帝乾隆时，皇帝拒绝了英国使团所有通关、通商请求，清王朝将自己的子民驱离海洋。

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崛起面前，以行云布雨的龙为图腾的农业文明无可奈何地衰落了。闭关锁国挡不住船坚炮利，中国市场力

量在被启蒙的同时惨遭蹂躏，东方古国最终沦为西方市场力量原始积累的药渣……1949年，中国脱离关贸总协定是市场规律对市场严重失衡的必然惩罚。

新的中国找回了主动的起点。但是，一个国家只基于自己少量的城市需求试图完成城市化进程，无异于拔自己头发脱离地球。更何况工业化必然与市场配置手段和现代管理制度相匹配，只有一个轮子的中国怎能长久平衡行驶？

痛定思痛后，我们选择了主动转向世界。循序渐进的市场化被引进，不仅原有的积累被转化为市场的力量，市场更催生了民间旺盛的生命力，两者的聚合使中国市场的能量日益强大，对世界资本越来越具有诱惑力；跨国公司500强，越来越急切地敲门入门；加上世界华人资本的力量，他们构成了今日中国市场的3支主导力量。

我们看到：当前这3支力量正形成竞争上的有效制衡。唯其如此，中国与世界的对接方不至于一边偏倒。三者的制衡是当今中国人世的最大利好。

市场竞争越激烈越均衡，各方投资的收益越会最大化，从而最大可能地融资和创造就业。这为中国化解转轨中的两大难题——金融风险 and 农业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入世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机遇降临眼前。随着发达国家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制造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已合情合理。中国不仅劳动力廉价，还有巨大的市场，跨国公司自然首选中国。我们曾经苦恼于WTO后的农村民生，我们曾经苦恼于中国13亿人怎么城市化，而当我们把农民问题和世界工厂连接起来，当农民通过世界工厂转变为工人，思路才能豁然开朗。

世界工厂对职业经理有强烈需求，这种需求正使职业精英形成一个新社会阶层。职业经理作为资方和劳方的中间人、利益结合部，决定了他们会努力寻找社会结构中的上下制衡。在我们的

身边，出身贫寒的优秀青年成长为职业精英，完成财富的积累已屡见不鲜，这使一个社会拥有了财富的光荣与梦想。

在3种经济力量的横向制衡，社会上下阶层的纵向制衡中，公平、透明的现代交易规则和监督制度已呼之欲出。中国人世的本质意义在于它引入了一个现代制度，中国以法的形式承诺采用国际化的市场管理规则。现代文明的蔚蓝天空离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近。

这是可望而可及的现代文明，它建立在中国职业精英成长的基础上；建立在中国3种社会经济力量的有效制衡中；建立在发达国家将制造基地转移，中国与一体化世界共赢的历史机遇里；建立在“文革”后国人自主意识觉醒、22年市场启蒙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充满理性而激动地预言：现代文明对中国再也不是空中楼阁。

我们不相信悲剧是中国人的宿命。

东方人柏杨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3个中国人是一条虫。他说的是自私的悲剧。

西方人熊彼德说：“如果个人主要关心自己的利益及他们较近的亲属的利益，（一个国家）增长的机遇会大一些。”他说的是自私的正剧。

国家如何迎接正剧，避免悲剧？是保持距离的制衡而不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合法利益的剥夺。无论是人类社会的人与人之间，集团之间，国家之间；还是自然世界的分子与分子之间，天空和大地之间，地球与太阳之间，成熟而稳健的结构都存在于动态均衡之中。

我们深信不疑：惟有公平、透明的竞争规则得以明朗，动态制衡得到制度和力量的保障，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能力才能各归其位，有机组成一条腾飞的中华巨龙。

那时候，龙再也不是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图腾，龙是所有中国

人自己。

2001年11月10日，中国入世，龙腾的天空从此豁然开朗。

（本文是作者为《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11月12日入世报道专刊撰写的社论）

中国可以富

开篇

直面转型中国

寻 找 大 时 代 蓬 勃 向 上 的 力 量

2001年11月初，我必须直面职业生涯中，迄今为止最困难的一篇文章——《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会授命我执笔中国加入WTO那期的社论。

这种信任让我备感荣幸也诚惶诚恐。一个13亿人口的国度，经过100多年的磨难与蹉跎，挣扎与反思，社会将诀别封闭，决意走向国际一体化的时刻，在立志成为中国最重要主流财经媒体的报纸上，执笔这样的一篇社论，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WTO已经近在咫尺，已经逼在所有中国人眼前，如果不作鸵鸟，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你不可能不看到，不可能不听到它逼近的隆隆脚步。加入WTO后，中国的未来是怎样的？是像悲观者危言耸听：WTO将导致农业和金融的双重危机，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金融危机会像在东南亚那样，几个星期就能横扫中国，使经济倒退10年？还是像乐观者描绘的锦绣图画：进一步的开放必然推动改革深入，外资的追加投资将为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中国经济将长期一枝独秀？

所有的人必须直面，我更无可逃避。社论必须显示报社的媒体立场，表明自己的看法。悲观还是乐观，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充满悲观的恐惧，还是审慎保留的乐观，抑或是充满理性激情的乐观？最后我选择的词，就如很多人在2001年11月12日那天看到的——豁然开朗。

接踵而至的问题是，你凭什么这样乐观？

悲观

《南方周末》：WTO使中国更富还是更穷？

“进退维谷，生死未卜”这是2001年初我个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未来命运判断的用词。

当时，我丝毫没有像现在这样洋溢着理性激情的欢乐情绪。在中国正式入世的一年前，也就是我2001年初加盟南方日报报业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之前，那个世纪之交，千年之野，最令人感怀的时刻，对于加入WTO后的国运民生，我忧心忡忡。

忧思在于，在我的眼前，中国改革一直在产权的坚关前徘徊不前，而开放却将随着加入WTO而国门洞开，改革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开放的速度，中国本土企业可能不堪一击，其溃败将会对中国金融业连锁产生极大压力。另外，中国的小农经济难以想象能与美国西方现代农业相抗衡。

沮丧的心态在2000年5月达到了顶点。5月19日，北京，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欧盟贸易谈判代表拉米正式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我当时即判断：中国加入WTO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被扫清了，“中国加入WTO的历史实际上在那一天的18时18分锁定”。

那时，作为《南方周末》的记者，我在《南方周末》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国加入WTO几成定局》中写道：“中国的未来发展的客观环境已经被锁定。WTO将极大地改变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最根本的变化是，作为个人，你必须面对全世界的竞争者，而不仅仅是你的同胞；作为企业，你也将面对全世界的竞争者；

作为国家，民族的市场与利益将在全世界的大范围内重新分配。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可以在这样的竞争中拥有更多的机会，更快变富，但也可能同样快变穷。”

我不否认，国际经济一体化后，各国降低自己的贸易壁垒，环球的资源能够得到更充分合理的配置，世界将产生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蛋糕。但谁也不能不承认，这个新蛋糕并不是单独分配的，它是和各国的既有蛋糕一块分配的，这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如果你的国家综合竞争力没有提升，你不但不能从新蛋糕中分一杯羹，甚至连自己原来既得的奶酪也被人家分走。

这就使中国加入 WTO 出现两种走势：中国可能变得更富，也可能变得更穷；中国可能变得更强，也可能变得更弱。我衷心期待中国能够更强，国民可以更富，但必须从现实找到必然的逻辑。

我还没有找到能够说服自己乐观的逻辑。

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的一场争论

“进退维谷，生死未卜”的第一次感触源于对一条生产线命运的思索。

这条生产线的兴衰沉浮，甚至在 1996 年 6 月引发了安徽省一场关于“引进外资”的大争论。事件的两位主角，一位是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一位是当时的合肥市委书记（由于两人都已经离开原岗位，而且我深信双方都是忠实于自身认知的，故而讲述这个故事）。导火索是我在《工人日报》发表的一篇新闻《顶住跨国资本的冲击》。那一年我 25 岁，大学毕业刚 4 年，是工人日报驻安徽记者站的记者。

引发这次轩然大波的是合肥开元轮胎厂，围绕着的是中国第一条全钢子午胎生产线的命运。那时，这条生产线因合资事件而落入“生死两茫茫”的窘境中。

开元轮胎厂是安徽省重点国有企业之一，是安徽省不多的在1993年至1995连续3年进入全国工业500强的企业，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轮胎企业之一。特别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开元厂在多年努力后，正试图将中国第一条全钢子午胎线形成生产能力，这种卡车用高质量轮胎，因高速公路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但要形成10万套生产能力还需上亿资金，按照开元厂原来的设想，他们希望借传统斜胶胎稳定的利润来支撑其成功。在此当口，合肥市主导，开元轮胎厂的斜胶胎部分与印尼企业佳通轮胎合资。佳通控股70%，开元的品牌消失。全钢子午胎就像姐姐带着的弟弟，当姐姐嫁人，被姐夫驱逐出门后，开始流离失所。

经过对合资事件的全面调查，我写了一篇新闻《开元合资启示录》见报时编辑将标题改成了《顶住跨国资本的冲击》这一带有浓厚政策色彩的标题显然极具冲击力。引起了安徽省和国家部委的高度重视。其时的省委书记卢荣景、省长回良玉等带着安徽省合肥市所有相关部门的领导3次前往调研，研究协调在合资成为既成事实后，如何把全钢子午胎搞起来。

他们二赴开元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闯到现场。厂长向卢书记介绍我后，举手投足间自有一种威慑力的卢握着我的手，客气地说：感谢你代表报社对安徽的舆论监督。第二位和我握手的人手冰凉，目光从我的脸上一扫而过，略带敌意地问：你就是那个记者？他是合肥市委书记钟咏三。

钟书记好像对我有意见。

当我在意这一点后，一打听，才知道他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我那篇文章是给合肥的“开放”和“引进外资”泼冷水，打棍子。

我决定主动找上门去，听一听他的真实想法，如果说是我错了，我会跟他道歉的。钟显然也是有胸怀的人，当我在电话里跟他约时间时，他果断地说，那你现在就过来吧。

一见面，钟先向我发了一通火，说，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但你要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成为别人手里的棍子。你知道你给我添了多少麻烦，给合肥的引进外资添多少麻烦。现在合肥所有的外商都来问我，是不是开放的政策又变了。你给佳通老总添了多少麻烦，你知道吗？现在印尼就是怕它的华人资本投到中国来，于是通过新加坡转投，你倒好，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印尼的……

“有些情况你不清楚。”钟咏三逐渐冷静下来 开元斜胶胎的利润来养子午胎已不可能了，斜胶胎市场严重供过于求，利润很低，自身难保。更何况全国各地都在争取外商投资，香港中策、韩国锦湖，甚至美国固特异都在投，如果他们都投到外地去，开元肯定竞争不过它们，如果开元倒闭了，所有的设备都可能浪费掉，所有的工人都要下岗，他们都要找我要饭吃。

“这就是合肥发展的客观条件。”钟无奈地说 国家优惠政策要么撒到沿海，要么就给西部，就是漏掉中间的安徽，向银行贷款越来越困难，我要发展，只有靠引进外资，从而给合肥创造就业，创造税收，合肥人才能有饭吃，你也是安徽人，难道不想看到安徽的发展吗？

我无言以对，面对这样一个有魄力，敢担当，不计个人荣辱的优秀地方官，我肃然起敬。无言以对，不是因为理屈词穷，而是实在不愿意更多地伤害他。

“民族工业”是一个过时的概念？

开元合资事件的冲突，并非孤立的现象。

1995至1996年，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制造业领域全面抢滩登陆，往往都是寻找国内较有实力的国有企业合作跳板。主导推动力多为合肥市这样的地方政府，而行业部委多持反对态度。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界也掀起了“引进外资”的

大论战，并形成了分野鲜明的三大阵营。

第一类为引进外资鼓与呼。他们的典型观点诸如：“积极引资莫彷徨，引资再多没有度”；为外资立论“凡是在中国土地上的企业都是民族工业，究竟有没有民族工业，还是个问题，它基本是一个过时的概念”；生怕“引进外资与发展民族工业的争论会给外商造成恐慌”，并驳斥“外资已经控制中国部分行业市场”的论点。

第二种态度是忧心忡忡。他们警告“外商加紧抢占我国市场”；“民族工业面临鬼子来了汉奸多的威胁”。“警惕吃买办饭的人把我们引入歧途。”他们认为，剥开外资含情脉脉的画皮，它是魔鬼。

第三种道路是理性观察防范风险，他们希望“密切注意利用外资新动向”。同时强调国家经济的主体性——“利用外资不是让它代替民族工业”；“经济不能自立，国家的经济安全就没有保障”。

开元合资事件正是发生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首先是它发生在非常有代表性的地点——安徽——典型的中国中部省份。其次，多方的利益博弈其中，均有较充分的体现：合肥市主导合资是出于发展地方经济；外资方非常希望能通过开元轮胎这样有很好市场基础和渠道的国企降低抢滩风险；化工部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又一个骨干企业沦落外人之手；企业的管理者不愿意因此失去位置，工人不愿意为资本家打工；而省委、省政府则要平衡各方要求。最后达成的妥协是，由省委、省政府出面协调资金，尽可能将全钢子午胎形成生产能力。

合资事件随着资金的落实告一段落，可我的思考却从此起步。第一，把跨国公司引进就万事大吉了吗？中国的本土企业有没有存在的必要？第二，跨国公司以其10倍，甚至百倍的强大资本实力，以本土企业难以望其项背的技术与管理能力，以选择强势

国有企业合资作为跳板的快捷方式切入中国，中国本土企业怎么才能生存下去？第三，由于原来国有企业人浮于事，跨国公司投资到位后，效率必然大幅提高，会产生严重的就业挤出效应。社会怎么才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若社会因此动荡甚至颠覆，那中国的现代化岂非前功尽弃。

没有现成的答案，反而刺激我产生了浓厚的求解欲望。

“遗产税”决定了资本的国家属性

第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是：中国本土企业没有存在的必要吗？

论证“民族工业过时论”者的主要逻辑是：只要是在中国投资的企业，都要支付工资，都要交纳税收，因此，资本是没有国籍色彩的。东南亚模式不就是外资经济成功的写照吗？只是话音未落，1997年5月，狂飙而至的金融风暴席卷了风光一时的东南亚。

“过时论”的论据虽然崩溃，但它的逻辑漏洞何在呢？在思索再三之后，我提出了自己的解答。这与财富的3轮再分配有关。外资企业支付工资只是企业财富的第一轮分配，是在外资资方与中国劳方之间完成的；税收是财富的第二轮分配，于毛利中，资方与中国政府进行的二次分配，这两轮分配的确无论何国投资，对东道国都是一样的。

且慢，这里忽略了第三轮分配，就是外国籍老板的遗产分配。跨国公司的资本所有人的遗产，均按国籍分配的，收益者当然是资本家所在国籍的国家及其国民（尽管也有一些超级富豪把自己的国籍注册在免税天堂，但那毕竟是少数）。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遗产税正成为政府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并可将它转化为公众的教育或医疗费用，进而转化为公众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